

# 饮茶思源

中国人最早发现茶，最早饮用茶。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茶须臾不离。茶，实在是地地道道的“国饮”。

## 神农氏得茶解百毒

《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眈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磽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茶即茶也。

神农氏是第一位发现茶能解毒，并有医疗神效的人。传说是史影。对于神农尝百草、以茶来解毒的故事，千古万代口传心记，千秋万载人人相通，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对于神话传说，我们不能一概斥之为虚妄不经的东西。事实上，神话传说的背后，有历史的影子。何况传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正如有人所指出：“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的朴素和自发的思维形式。”（江林昌《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先秦史学、文学、民俗学》）

茶叶在远古时代是一种药物,《神农本草经》说“茶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说的就是以茶为药。之后,茶逐渐从药用转化到饮用。三皇五帝之一的神农氏得茶解毒,宽泛而言,也可算作展开了中国贡茶的第一章。

## “伐纣会盟”武夷君献茶

贡茶是古代地方部落专门进献给帝王或国君盟主的乡土特产,其起源于上古时代。据《华阳国志》记述,以茶作贡品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南方庸、蜀、羌、苗、徽、缙、彭、濮八个小国兴兵来会盟,当时茶叶已作为一种土特产进贡。商纣是以酗酒著名的,在《商书·酒诰》中说“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冲天,连天都发怒了”。周武王则与纣王恰恰相反,由于他的治国方针是勤俭节约,严禁饮酒。在这样情况下,他将各国的贡茶来代酒,无形中促进了茶业发展。

南方八个小国的贡茶,可考的似属武夷君献茶。

“闽之有书,蚡自职方氏。”(黄仲昭《八闽通志》)据《周礼·职方氏》载:“叔熊氏避难于濮,随其俗,后子分七种,古谓之七闽。”汉经学家郑玄援引《国语·郑语》中“闽,蛮夷之别种,而七闽乃周所臣服国数也。”李光坡《周礼述著》卷十九按“蚡为楚国姓,这就是说古代的七闽部落和楚国都是称为蛮的南方少数民族。3000年前的叔熊氏居濮地,尔后有七闽,从而得知武夷族是濮人的一支。七闽的分布地区甚广,包括今天的全部福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君长,据传曾参与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

福建考古界对武夷山架壑船棺进行发掘,经碳14测定,得出船棺制作年代距今3620±130年,上限年代早于殷。这说明相当夏商

之际，武夷山区就有先民居住，其族号为“闽濮族”或“武夷族”。武夷山古代传说中的武夷君当为其君长。闽濮族比闽越王无诸（前340—前110）统治早800多年，是早期活动在闽北山区的福建土著过的氏族社会生活。《武夷山志》记载武夷茶属野生非人力所植；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释超全《武夷茶歌》），这位献茶老人就是汉祀者武夷君，也就是闽濮族君长，向周武王献茶的少数民族的首领。

《华阳国志》中贡茶的“濮”与《八闽通志》、《福建史稿》上的“濮”正与武夷山船棺葬之族属“闽濮族”考证相同，史实相符，从而证实商周时建茶已和巴蜀茶一道作为贡茶而问世了。

## 周武王首受贡茶

周代“诸侯朝覲，各以其所贵宝为贄”（《诗·韩奕篇》），进贡之制便始于此。

周武王会盟伐纣胜利后分封诸侯，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周武王）上贡。《华阳国志·巴志》中开具了这样一份纳贡清单：“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

既是贡品，一定珍贵。但巴王上贡的茶却是珍品中之珍品。这份贡单后还特别加注了一笔：“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蕝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培植的茶园里的香茗。

周武王接纳了这宗朝覲之贡茶后，是用来品饮、药用或赏赐，还是别有所为，不得而知。《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茶，即古茶字。掌茶在编制上设二十四人之多，干什么事呢？该书又称：“掌茶：掌以时聚茶，以供丧

事 征野蔬材 以待邦事 凡 畜聚之物。'原来茶在那时 不仅是供饮用，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礼居事时的必不可缺的祭品，必须设置专门掌管。《尚书·顾命》中说：“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诰（即茶）”在周成王时 茶已代酒作为祭祀之用。

同时 周朝的聘向礼旨在“使诸侯相尊敬”。《礼记》载：“诸侯比年（每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主礼人视礼之等级而定：“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礼品为圭璋。其用意是调整天子与诸侯及诸侯与诸侯间的人际关系，当时的礼品是玉石，随后，茶便替代了玉石，成为上流社会互聘之礼品，后来发展成馈赠之礼品。

## 吴主首倡茶筵代酒

三国时，在长江下游的东吴，宫廷饮茶习以为常，茶已是吴国宴会上的高级饮料。《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了吴国末代国主孙皓以茶代酒一事。

孙皓经常举行宴会，招待群臣，规定凡参加宴会的人，至少都得喝酒七升 每次斟满杯后 举杯一饮而尽 并亮杯说干 喝不下者就硬灌。当时大臣韦曜非常受宠信 但不会饮酒 酒量不过二升 孙皓对他特别优待，担心他不胜酒力出丑态，就暗中赐给他茶筵代酒。所以 每次宴会上 不喝酒的韦曜 居然能和群臣一样干杯 喝酒七升。这就是以茶代酒的故事。

孙皓早先受封乌程侯。乌程（今浙江湖州）是我国较早的茶产地。据山谦之《吴兴记》载 吴兴郡治所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 出产御筵。筵即茶。孙皓登基后 乌程出产的御用茶 恐怕就是专门供给他的。

东晋永昌初 温峤官于宣城 造御茶以贡 上表贡茶千斤 茗三百斤。这是较早的向皇帝进贡茶叶的表章文字。

## 隋文帝饮茶治头痛

茶之行世，常以廉俭为本。隋文帝勤于政务，自奉甚俭，茶却常侍左右。某夜，隋文帝做了个恶梦，梦醒后一直头痛。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头痛就消除。”隋文帝命人上山采茗草，煮好药汤服下，果然见效，于是下诏征集茶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当时人们竞相采啜茶茗。这也就是“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出典。

# 历代贡茶

唐以来 历代王朝都将茶叶列为大宗贡品 阴定制度 定点、定量索取茶叶，史称贡茶。凡被封建王朝指定为贡茶者，必是当时闻名海内的一流名茶。

贡茶初始，是各地方官府征集各种名茶以土贡名义进献朝廷。后来，土贡不能满足需要，便由官府设置茶场，直接管理，督造御茶，精制各种名茶入贡朝廷，成为一种制度。

## 唐代贡茶

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茶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茶经》才出现茶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有边茶生产和“茶马贸易”。各种茶宴、茶会兴起，并进入宫廷。名茶产区多有贡茶生产。

贡茶制形成于唐代。其较为直接的缘由主要是佛教于茶事的活动。据载：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当时各地梵宫寺院多至三百余座，僧侣云集。他们攀危岩，冒飞瀑，竞采野茶以充饥渴。各寺亦有于白云深处劈岩削谷，栽种茶树者，焙制茶叶，名云雾茶。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山东、河北的部分地区，直至首都长安，茶

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封氏闻见记》）以示风雅。上层人物和皇帝信仰佛教、支持佛教，并把茶文化作为封建帝王礼敬佛祖最高礼仪，于是王室为了满足自己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十分崇尚饮茶、重视贡茶生产和贡茶制。

唐代贡茶分民贡和官焙。

民贡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620）、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随后有蕲春郡（今湖北蕲春）义阳郡（今河南信阳）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及吴兴郡（今浙江湖州）于武德四年（621）贡茶。除吴兴郡进贡紫笋茶外，另三郡的贡茶均为蒸青团茶、饼茶。

后来又有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贡腊面茶灵溪郡（今湖南龙山）、汉阴郡（今陕西安康）分别于天授二年（691）和至德二年（757）贡芽茶。另外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贡黄孽茶、寿州（今安徽霍山）贡黄芽。其他就不一一列举。

上述都属于土贡性质，即由地方主动贡献。朝廷还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郡纳贡。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郡，即山南道的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江南道的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定郡、福州长乐郡、饶州波阳郡，黔中道的溪州灵溪郡，淮南道的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蕲州蕲春郡、申州义阳郡和剑南道的雅州卢山郡。这十六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等十个省。因此，不难看出，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几乎无例外地都要以茶进贡。贡茶数量大得惊人。元和十二年（817），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可见贡茶数量之大。

官焙：随着饮茶需求的不断扩大，朝廷又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营造，专业制作贡茶，开辟了贡焙制，是贡茶的另一个重要的来

源和主要组成方式。

大历五年(770)，一所著名的贡茶院在湖州长兴和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山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所产顾渚紫笋茶扑人鼻孔，齿颊留香，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羨茶同列贡品。

顾渚贡茶院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贡茶院有茶厂三十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造紫笋茶。每年贡期花“千金”之费生产万串以上。《南部新书》记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四千八百斤。”

每年初春时节，清明之前，贡焙新茶制成后，快马专程直送京都长安，献上皇帝。茶到之时，宫中一片欢腾。唐代吴兴刺史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就描写了此情此景。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唐翰林学士李肇《国史外》记载：“长兴贡，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从长兴顾渚到京都行程三四千里，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十日赶到，所以叫“急程茶”。而修贡长官每年春季制造贡茶时，以春游大事排张。湖、常两州刺史，首先祭金沙泉的茶神，最后于太湖中浮游画舫十几艘，山上立旗张幕，携官妓大宴，饮酒作乐。

唐代诗人袁高曾写有一首长诗《焙贡顾渚茶》，又名《茶山诗》，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愤慨。袁高，字公颐，唐建中年间拜京畿观察使，在建中二年(781)担任督造紫笋贡茶的湖州刺史。当时，袁高将他的《茶山诗》随贡茶一并献给皇帝，这对后来的“减贡”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据《西吴里语》记载：“袁高刺郡，进茶三千六百串，并诗一章。”《石柱记笺释》补充说：“自袁高以诗进规，遂为贡茶轻者之始。”

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院建于唐代大历五年(770)，迨至明洪武八年(1375)兴盛时期长达605年。”

唐代的贡茶品目 据唐《国史补》记载 有十余品目 即 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建州方山紫笋、建州大团、岳州 鬯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夔州春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羨此外，尚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嵊县的剡溪茶等

## 宋代贡茶

宋代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旧籍说茶业兴于唐，盛于宋。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 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颇深，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宋代贡茶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制造上更上一层楼，无论采摘、焙制、造型、包装、递运、进献诸方面都有明细规定，命名也十分讲究。

宋初，贡茶规模很大，五代遗存的割据政权南唐、吴越、闽均向宋廷大量贡茶。如南唐统治建州期间，一次就贡茶三十万斤，吴越也一次就供进浙茶十万斤。统一后的宋代，贡茶地区达三十余州郡，约为全国产茶州郡的二分之一。

宋代焙局除保留顾渚贡茶院之外，在建州北苑又设专门采进贡茶的官焙，规模之大，役工之多，采造之繁，远远超过前代。

“年年春自东南来 建溪先暖冰微开。”范仲淹诗 建州的地理环境与湖州顾渚相比，丛山深岫，云雾缭绕，纬度更低，更靠南面，气候决定茶叶优异，还能保证“京师三月尝新茶”。

建茶作贡，并非始于宋代。据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记，早在闽康宗通文二年(937)，“贡建州茶膏 制以异味 胶以金缕 名曰耐重儿 凡八枚”即开始入贡 闽灭 南唐在保大四年(946)春 也“命建

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入宋后，朝廷仍以顾渚为焙，以紫笋为贡。据《建安志》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始置龙焙，造龙凤茶。”建茶出，一度短时期废除了顾渚贡焙。葛常之曾说：“自建茶入贡，阳羨不复研膏。”（阮阅《增修诗论总汇后集》卷三十一引）即贡焙正式由顾渚改置北苑。

唐时陆羽《茶经》不第建茶。宋时刘焯《龙云集》卷二十八载：“今日第茶者，取郝源、壑源为上。至如日注、实峰、闵坑、双港、乌龙、雁荡、顾渚、双井、鸦山、岳麓、天柱之产，虽雀舌枪旗号品中胜绝，殆不得与郝源并驾而驰也。其品制之殊，则有若京挺、六花、叶家白、王家白，其色类之殊，则有若的乳、白乳、头金、蜡面、京挺。如事者往往抵金茶民，不远千里。”在太平兴国初年，北苑贡焙只造龙凤团茶一种。到至道初，除龙凤茶外，又造石乳、的乳、白乳以进。庆历年间，造小龙团以进。自小团出，龙凤遂为次。元丰年间，又造密云龙，其品又高于小团之上。绍圣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翔龙。徽宗赵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为第一；继而“又制三色细芽及试新鏐、贡新鏐等。自三色细芽出，瑞云翔龙又居下矣。”（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

北苑贡茶争奇斗异，代有新品出产；新品一出，前茶即降为凡品；以致名目愈来愈多，举不胜举。以北宋末年的北苑贡茶为例，即有四十余品目，共分十纲：第一纲叫试新，第二纲叫贡新，第三纲有十六色，分别叫龙凤胜雪、白茶、万寿龙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龙凤英华、玉除清赏、承平雅玩、启沃承恩、云叶、雪英、蜀葵、金钱、玉华、寸金，第四纲有十二色，……第五纲有十二色……再以下五纲，都是大小团。贡茶达于极盛，有五万余片，精品约在五千斤左右。建州产的蜡茶上供则达二十一万余斤，为历朝之最。

北苑有公、私之焙一千三百三十六处，其中官置贡焙就有三十二处，其名称见于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北苑贡焙日役千夫，工

价万金乃寻常事，反映了宋王朝的穷奢极侈。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了每种贡茶的制作、工艺、焙制时间都有严格的操作顺序和具体规定。

至道、庆历中，丁谓、蔡襄相继任福建转运使，分别在北苑创制大、小龙凤茶上贡，每斤为八饼、二十八饼；元丰中，贾青任福建转运使，又制密云龙双角团紫，每斤四十饼。这些极品贡茶制作精细，包装讲究，成本极高，一饼价值竟高达四十缗，远胜黄金。

杨亿《谈苑·建州蜡茶》记载，建茶凡十品，何种茶赐何等官吏都有具体规定。如龙茶仅赐二府大臣、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仅得凤茶。体现了封建王朝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秩序和伦理。宋廷对中高级官员在其升迁、退職、病休、覲见时，派中使（太监）专赐银盒装盛的茶药，并以圣旨示皇恩浩荡；收到者皆须上表谢恩。《全宋文》中便有成千上万的无聊文字。苏轼还以《叶嘉传》作贡茶入贡为游戏文章。贡茶还用分赐出征将士、修河役兵、僧道庶民等。朱熹弟子黄干为师“庆元党祸”冤案平反昭雪，得宁宗的赏赐武夷茶园一片。此外还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前来朝贡或出使的外交人员。庆历三年（1043）订立的宋夏和议中，还规定“岁赐”西夏大茶（边茶）三万斤，合二十万斤，作体面和平的一种赎买物，这在历朝中绝无仅有。

宋代除建州茶要按纲按时到达外，对其他贡茶也有限制。大中祥符二年（1009）九月《纳茶日限诏》云：茶库受纳片茶，各定日限，看验交纳，无得留滞。片茶，潭州大坊茶五万斤，限半月；诸州茶五万斤，限十日，三万斤六日。散茶，五万斤四日，三万斤三日。腊面茶，万斤四日。可见宋代缴纳贡茶的限定严格。

宋代贡茶困扰园户茶农，乃至真宗曾一次罢进三十余州贡茶。范汝为茶农起义，摧毁过北苑龙焙。后来又有叶宗留起义，园户逃散，建茶产量锐减，贡茶额骤减。至淳熙年间，定上贡茶叶每年以五万斤为额，只及北宋末的四分之一，但仍恢复四十余个名品，为细

色五纲，粗色七纲，循序供进。

宋代在建州大规模设置贡焙，有力推动和促进了闽南以至我国整个南部茶叶生产的发展。唐代时，陆羽《茶经·八之出》记述我国最南的茶叶产地：“思（今贵州务川）播（贵州遵义）费（贵州德江）夷（贵州石阡）鄂（湖北武昌）袁、吉（江西吉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时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还不多，只能偶然获得。但是，到宋代以后，如《太平寰宇记》所记我国最南的产茶州军，就有江南东道的福州、南剑州、建州、漳州、汀州，江南西道的袁州、吉州、抚州、江州（今江西九江）鄂州、岳州、兴国军、潭州、衡州、涪州、宝化县、夷州、播州、思州，岭南道的封州、邕州、容州等。从上录的茶叶产地中不难看出，《太平寰宇记》记述的南方茶叶产地不仅较《茶经》多得多，而且从福建和两广来说，其南缘产茶州县，也呈现向纬度更低的沿海地区伸展的趋势。

另外，据记载，建州所产蜡茶已开始从海上向海外输出，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 元代贡茶

元代，是中国贡茶经过唐、宋的发展高峰到明、清的继续发展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

元代以生产散茶、末茶为主，团饼数量很少。皇庆、延祐年间成书的《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撮要》在茶叶的制造方法上都谈到了茶叶略蒸，颜色稍变后，摊开扇凉，用手略揉，再行焙干的制造方法。其中揉可以视为制造条形茶之开始。同时，《王祯农书》在谈到蜡茶、团茶时说：“其制大小龙团，带跨之异。此品惟充贡，民间罕见之。”可见元代团饼茶仅限于充贡，产量很少。民间饮茶之风趋向条形散茶了。

元王朝的统治阶级是游牧民族，虽然对茶极为需要，但是没有唐宋王朝那样奢侈讲究。贡茶入元后，贡茶制有所削弱，定额纳贡，仍照旧例实施。

元王朝上层统治者逐渐接受汉族的茶文化的熏陶。朝廷用茶仍继续保留宋代遗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北苑官焙受黄华起义军的影响，仅留部分外焙。至元十六年（1279）浙江行省高兴领平章事开府建州（建瓯市）路过武夷“羨芹思献 谋始于冲佑道士”制石乳二斤入献皇宫（赵孟頫《茶场记》）深得元帝忽必烈赏识 命其子久住在武夷置焙局。据《武夷山志》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初贡仅二十斤，采摘户才八十”；至正末贡茶达九百九十斤。据统计，大德三年（1299），全国还有一百二十处茶园受朝廷控制制造贡茶。

元代宫廷饮茶，宋风尚存。至元十五年（1278）朝廷还设有专门官职 掌管内廷茶叶的供需。《元史》卷八十七记载：“有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秩正四品，掌常湖二路茶园户二万三千有奇，采摘茶芽 以贡内府。”还有“建宁北苑 武夷茶场提领所 提领一员 受宣徽院，掌岁贡茶芽”。御茶园的设置对元代茶叶的消费与生产，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而《王祯农书》上说：“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自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可见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朝野饮茶之普及风兴盛。

唐、宋时期茶叶消费生产多以饼茶为主。至元代，除了继续前人的饼茶制造，出现散茶消费生产，而且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农书·百谷谱十》上说 茶之用有三 曰茗茶 曰末茶 曰腊茶。武夷茶当时除生产部分龙团（腊茶）外，就有大量的茗茶（当地人称“茶茗”）腊茶惟作上贡。

元代茶叶实际上分为两大类型，即饼茶与散茶，饼茶主要是皇室宫廷所用，民间则以散茶为主。元大臣耶律楚材诗云：“积年不啜建溪茶（建州贡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

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谿老三瓯梦亦除。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饶烟霞。”诗人回到西北长年饮不到建溪贡茶，感到心窍塞满五车黄尘。回忆起昔日在宫廷畅饮建溪茶，美好感觉难以忘怀，借用卢仝和从谿的嗜茶典故来表达自己对好茶的梦寐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上层阶级的饮茶生活。诗又云：“高人惠我岭南茶，烂赏飞茶雪没车。玉屑三瓯烹嫩茶，青旗一叶碾新芽。颇令衰叟诗云爽，便觉红尘客梦除。两腋清风生坐榻，幽欢远胜泛流霞。”这显然是饮用散茶之描述。叶子奇《草木子》载：“御茶则建宁茶山别造以贡，谓之嗽山茶，比之蔡襄所制龙凤，费则约矣。”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顺茶，食茶也。”当然，宫廷与民间之所好，并无绝对，即使散茶、末茶，有一些精品在元代王室宫廷中，也有所用。如“金字茶等江南湖州造进末茶”。又“范殿师茶，系浙江庆云路造进芽茶，味色绝胜诸茶”。宫廷有酥茶与清茶，皇宫就例用酥茶，大臣日常则用茶芽烹制的清茶。腊茶在民间也偶有所用，元人有诗谓：“半青米子难成夸，宜着山僧点腊茶。”所以元代的饼茶、散茶以消费对象之区别，只是大体上有所侧重。元人蔡廷秀《茶灶石》诗云：“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说明武夷御茶园也生产散茶。又李谦亨《土锉茶烟》诗云：“汲水煮春芽，清烟半如灭。”都说明元代散茶之普及。至明初，朝廷禁止进贡团茶，而以散茶代之，散茶地位更是占绝对优势，由腊茶改散茶，当以元代为过渡时期。

元代的茶叶的饮用，主要还是沿前人的煎煮法。元人洪希文《煮土茶歌》：“论茶自古称壑源，品水无出中冷泉。莆中苦茶出土产，乡味自汲井水煎。器新火活清味永，且从平地休登山。王侯第宅斗绝品，揣分不到山翁前。临风一啜心自省，此意莫与他人传。”《续轩渠集》点茶工夫也颇具要求。《王祜农书》云：“凡点茶汤多茶少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匀，又添注入，回环击拂，视其色鲜自着，盏无水痕为度，其茶既甘而滑。”而且，元代的茶饮用，也开始了一些新的趋势。

元代开始较为普遍的用直接焙干的茶叶煎煮的清茶，宫廷饮茶先用水滚过滤净的茶芽，少时煎成。这时开始出现了泡茶方式，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发展至明代，泡茶更成为主要的饮茶方法。

蒙古宫廷饮茶，吸收了某些汉族的饮茶方式，结合了本民族饮茶特点，形成了具有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如有“兰香、玉磨末茶二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忽思慧《饮膳正要》），又有酥签茶、将好酥点茶，这显然是汉蒙饮食文化交流的结果。

尽管朝代短暂，但朝廷贡茶消费生产水平提高，元代的茶文化具有一定特色。特别是一些茶文化内容的改进创新，更为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兴旺、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 明代贡茶

明代贡茶经历了一个变革的时期。

明代贡焙制有所削弱。太祖朱元璋出身元末农民起义，转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所接触，并表同情。他在南京称帝后，见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团凤饼茶，感叹不已。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惟采茶芽以进”（《枣林杂俎》），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团饼茶，改革为直接冲泡散茶“一瀹而啜”法，遂开我国数百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茶叶到了明代，产制方法又有一大的变革，不但将饼茶完成改成了散形茶，而且将蒸青改为炒青。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入贡“惟贵叶茶，饼制遂绝”。又《潜确类书》说：“国朝始用芽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而龙凤团皆废矣。”昔以蒸碾为工，今以炒制为工。”他们认为碾造愈工，茶性愈失，并且说过去的制法，不

像现在精于炒焙不失本真的好。罗稷《茶解》阐明了此一观点 公然说陆羽《茶经》“其春碾罗制诸法 殊不足效”。所以在明代就为今日绿茶生产奠定了基础。到了明中后期，改制已臻完善。

明代由于处在茶叶产制的重大变革时期，茶叶专著十分丰富，不下数十种。至于杂文杂说和诗词更是不计其数。对茶叶的改革制造情况，都有较完整详实的记载。

由于明代贡茶采用散茶，宋代建立的北苑龙团贡茶制度，明初袭至三十六年（1557）建宁太守钱璞 一作 岷 因巡查发现武夷御茶园本山茶枯，御茶改贡延平，历时二百六十多年御茶园遂废。

《明史·食货志》载：明太祖时建宁贡茶一千六百斤（含全府各产茶区贡额）到隆庆初 增到二千三百斤。”其他各地贡茶额也都比宋代增加。其增加的数额中，相当一部分是督造官吏层层加码之故。弘治年间 进士曹琥《清单贡茶奏疏》 曾揭露了这种贡茶苛政，《疏文》说：“臣查得本府 广信府今江西上饶 额贡芽茶 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 额贡之外 有宁王府之需 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 有芽茶之征 有细茶之贡。始于方春 迄于初夏 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 各失其业 奔走山谷 以应诛求者 相对泣。因怨而怒 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太监之贡 岁办千有余斤 不知实质朝廷者几何。”奏疏中接着陈述了贡茶的五大害处 其一 采制贡茶正当春耕季节 农民男废种 女废织 全年衣食无着 其二 早春二麦未熟 农民饿着肚子采茶制茶 困苦不堪 其三 官府收茶百般挑剔 十不中一 茶农只好忍受高价盘剥 向富户购买好茶 以充定额 其四 无法交够定额 只得买贿官校 以求幸免 其五 官校乘机买卖贡茶，敲诈勒索，整得茶农倾家荡产。

明代史籍中记载贡茶的资料十分丰富，其中最详备者是谈迂的《枣林杂俎》 该书有专节记录明代贡茶的产地和贡额 岁贡排列如下：

[江苏贡] 宜兴县芽茶百斤。内 茶 二斤 上南京礼部。

〔安徽贡〕六安州芽茶三百斤。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县芽茶二十五斤。

〔浙江贡〕长兴县芽茶三十五斤，纳南京。茶出顾渚，即峇茶也。以僧大方制法，剪去尖末，号大方茶。嵊县芽茶十八斤。会稽县芽茶三十斤。永嘉县（今温州）芽茶十斤。临安县茶二十斤。乐清县茶十斤。富阳县茶二十斤。慈溪县茶二百六十斤。县西南六十里……其山颇产茶……因置茶局进贡。元、明皆仍之。丽水县芽茶二十斤。金华县芽茶二十二斤。龙游县芽茶二十斤。临海等县芽茶十五斤。建德县芽茶五斤。淳安县茶五斤。遂安、寿昌二县各茶五斤。桐庐县茶五斤。分水县（今归属桐庐县）茶一斤。

〔江西贡〕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赣州府芽茶十一斤。袁州府茶十八斤。临江府茶四十七斤。九江府茶一百二十斤。瑞州府茶三十斤。建昌府茶二十三斤。抚州府茶二十四斤。吉安府茶十八斤。广信府茶二十二斤。饶州府茶二十七斤。南安府南康县茶十斤。

〔湖广贡〕武昌府芽茶六十斤。岳州湘阴县茶六十斤。宝庆府邵阳县茶二十斤。武冈州茶二十四斤。新安县茶十八斤。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宁乡县茶二十斤。益阳县茶二十斤。

〔福建贡〕建宁府：建安芽茶千三百六十斤，内探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六百六十二斤。紫笋二百二十七斤。荐新二百零一斤。按何乔远《闽书》：崇安县茶九百四十一斤，内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荐新四百二十八斤。

在列述各地贡茶之后。《枣林杂俎》总结说：“计天下贡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建宁茶品为上。宋元时所贡，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明初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其芽以进……宋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之名未着，至元设场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明代不贡闽茶，即贡，也只是作宫中浣濯瓶盞之需。从贡茶产量来看，福建最大，主